

# 中国灵魂争夺战

习近平治下的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



## 目录

---

概述	1
总论	4
变化中的宗教控制和迫害机制	15
图表：关键的宗教控制手段	24
地图：各省宗教迫害情况	25
I. 汉传佛教和道教	26
II. 基督教	42
III. 伊斯兰教	66
IV. 藏传佛教	86
V. 法轮功	108
建议	130

## 关于作者

---

萨拉·库克是自由之家资深东亚研究分析员，为本项目主任以及报告作者。她主持《中国媒体快报》，每月一期，以中英文两种语言提供有关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新闻和分析。她还是两份自由之家特别报告的作者：《政治局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压制政策的局限性》（2015年），以及《中国审查制度的阴影：中共媒体管制如何影响全球新闻媒体》（2013年）。

## 研究、编辑和顾问团队

---

五名精通中国宗教群体的专家（三名博士候选人、一名独立研究员、和一名记者）为本报告的五个章节提供了研究支持，但他们希望保持匿名。Tyler Roylance (自由之家编辑), Annie Boyajian (自由之家倡议负责人), 以及实习生Bochen Han 与 Cathy Zhang 提供了编辑和研究协助。三名希望匿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担任了学术顾问。

## 致谢

---

本报告因为得到了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的慷慨支持才有可能完成。特别感谢Arch Puddington, Daniel Calingaert, 和 Robert Ruby提供意见和反馈。Garry Fey 担纲图像设计师。

## 封面说明

---

在2016年2月藏历新年期间，大量中国军人在甘肃省拉卜楞寺外聚集，防止抗争爆发。(Christophe Boisvieux/Getty Images)。

## I: 汉传佛教与道教

### 迫害严重程度:

汉传佛教

低

道教

非常低

### 迫害变动趋势:

汉传佛教



保持不变

道教



保持不变

### 主要研究结果

- 1 复苏:** 汉传佛教和道教过去三十年从几近灭绝经历了长足复苏, 但它们的规模和影响力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前相比, 仍显失色。汉传佛教以约一亿八千五百万到两亿五千万的信众人数, 为中国最大的已制度化的宗教。
- 2 干涉控制:** 大量规章和官僚控制确保两宗教在政治上的驯服, 然而, 政府不当限制在其他国家视为例行性的宗教活动。其中不切实际的寺庙登记条件、不经常性批准传戒、以及官方干预寺庙行政等控制手段, 严格限制了一般民间出家人和信众的宗教信仰。
- 3 习近平治下:** 习近平主席在宗教政策修辞上做了些许调整, 但基本上仍继续前任胡锦涛的政策。对中共领导人而言, 汉传佛教和道教逐渐被视为实现党在国内与国际上政治和经济目标的重要渠道。2006年一位汉传佛教僧人罕见地遭到政治指控而被判刑。
- 4 商品化:** 开发寺庙以获取数十亿观光产业商机, 已成为政府、僧人、和信众之间主要矛盾点。
- 5 宗教界应对:** 宗教界领导和僧众愈发果断地采取免费或低廉的寺庙门票, 在阻挡商业化侵袭上, 时常有所进展。



在浙江省一个景区，游客们穿梭于观音像下。这些环寺庙而建、收门票的景区日渐成为地方佛教领袖与政府紧张关系的来源。

图片来源：Kuei-min Chang

“佛教理想与中国梦的价值契合、会通……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而奋斗的思想基础。”

—方立天，佛教哲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2003 <sup>1</sup>

“很多地方政府把寺庙看作是地方收入来源。市政府开发周遭地区要把寺院圈起来收门票。但是师父绝不会同意。他说那天我们得靠收门票生存时候就是我们把寺院关起来的时候。”

—江苏省寺庙僧人 <sup>2</sup>

## 文革后的复苏与扩展

汉传佛教、道教以及各式民间宗教，数千年以来为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sup>3</sup> 虽然中共视其为封建残留，但是在其执政前十七年内，还是容许部分程度的宗教活动。在政府管控下，设立社团主义式的宗教协会来管理信仰。然而，政府部门接管寺庙管理，僧道被迫参与劳动，举行宗教仪式的危险性逐年增加。

国家对宗教有限度的容忍在文革期间（1966-76）消失。积极消灭宗教政策成为主流，寺庙受到破坏，经书遭到焚毁，僧尼被迫还俗、拘禁、和殴打。广大信众在严峻压迫的氛围和政治动乱下，纷纷停止公开及私底下表达其信仰。

毛泽东逝世后以及1978年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后，中共大致重拾其于文革以前的宗教立场，开始较大程度容忍汉传佛教和道教，甚至支持寺庙重建。随着幸存宗教领袖恢复其活动，中共消灭宗教信仰的尝试已明显失败。

严格的法规架构、广泛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继续防止未加控制的宗教增长。即便如此，汉传佛教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已制度化的宗教，而道教也逐步地经历较小规模的复苏。

时至今日，中国登记有案的各式大小佛寺道观超过38,000所，<sup>4</sup> 僧尼道士至少120,000人。<sup>5</sup> 基于种种因素，像许多中国人信仰实践混合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并且不参与任何正式的宗教组织，确切信众人数无法确定。然而，一般认为数亿中国人自认为佛教徒与道教徒。2007年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估计中国有一亿八千五百万佛教徒，一千二百万成人明确表态认同道教，有更多人（一亿七千三百万）表示他们参与部分道教活动，不过这些活动可能与民间宗教有所重叠。近年皮尤研究中心估计直至2010年，中国有两亿四千四百一十一万佛教徒，相当于总人口的18.2%。<sup>7</sup>

日常宗教活动多元，信仰实践内容受到宗门、地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大部分的汉传佛教和道教仪式以寺庙为中心，寺庙历来是僧道提供信徒服务及指引的场所。大型寺庙为中国人和外国人所熟知，但更为常见的通常是只有一到五位僧尼的小寺庙。这些出家人平日专注于个人修行、禅修、维护寺庙、以及为周遭信众提供服务，他们通常仅面临地方政府当局的有限度干预。<sup>8</sup>

佛教和道教信徒修行大多以功德为中心，除了给寺庙贡品之外，个人可以通过做好事以及遵循道法来积累功德。他们相信个人的功德能够为此生、身后、及未来转世带来好处。人类学研究指出，此教义逐渐在城市中国民众的生活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市民从功德或因果的概念中，寻找日常生活指引，即便他们本身不见得会定期参与寺庙的服务或仪式。<sup>9</sup>

种种迹象强烈显示，若不加以阻挠，上述的复苏和扩张会持续下去。首先，目前僧道和信众人数与文革前比较相形失色，意味这两个信仰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能。<sup>10</sup> 第二，寺庙也在信徒的积极协助下，透过举办法会、宗教知识讨论会、宗教庆典、慈善工作来加强他们的影响力。第三，从已登记的寺庙数量来看，对宗教服务和指引的需求仍胜于供给，若前述统计数字正确的话，每6,400名信众才有一间政府批准的寺庙，表示寺庙极度短缺。<sup>11</sup> 因此，两个宗教即使在和党国最具合作关系的前提下，仍有很大程度不受法律支配的宗教活动。例如，2014年，福建省有超过两万间未登记的道教场所，几乎是已登记的1,263所的15倍。<sup>12</sup>

## 提倡汉传佛教和道教以服务党的目标

自文革结束后，中共的宗教政策演变从加速宗教消失，到辨识部分宗教界和其领导如何能推进中共一连串政治和经济目标。这个态度虽适用所有官方认可的宗教，但汉传佛教以及较小程度上道教，尤其如此。

宗教有各种方式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上帮助推进中共政策目标。在国内方面，马克思意识形态已失去其大众吸引力，中共领导人于是借由宗教来支撑党的统治正当性和民族主义。佛教慈善组织或寺庙在官方的鼓励下，也逐渐参与社会公益，提供服务给弱势群体像孤儿、老人、自然灾害受灾人口。据闻党领导人认为佛教慈善组织或寺庙，比其一般世俗化的非政府组织或基督教慈善团体，较不具有政治威胁，甚至可以取代这些团体的社会角色。<sup>13</sup> 同时，国际和国内旅客游览具有历史、艺术、和信仰重要性的宗教景点的兴趣日益增长，形成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数十亿观光产业。

在国际上，中共试图借由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力来建立“软实力”以及改善与台湾社会的关系。中共投射软实力的企图在胡锦涛时期、当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取得重要性，该政策的中心面向是呈现中国政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旗手和倡导者。传统中华文化几乎是儒家思想、佛教、与道教遗产和影响的同义词。

这番企图在宗教政策中，表现在政府对国际会议的支持。举例来说，从2006年至2015年，中国组织和主办四场先前并不存在的世界佛教论坛，邀请来自30多个国家多达1000名宗教领袖、僧尼、和信徒参与。<sup>14</sup> 除了会议本身内容，僧人们因中国赞助而齐聚一堂、令人瞩目的影像，透过中国国家媒体放送全球，展示中国政府表面上的宗教宽容。<sup>15</sup> 2011年，中共也为一主要国际道教会议提供支持。<sup>16</sup>

反之，就此中共视汉传佛教为较有用及较不具政治威胁性的象征例子来看，<sup>17</sup> 中共并未替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举办类似的国际会议，官方并且不欢迎藏传佛教领袖像达赖喇嘛参与。海外非政府组织首先获得中国政府首肯于2010年在中国建立分支的是一来自台湾的佛教慈善组织，这再次显示比起世俗化和其他信仰的慈善组织活动，中共对佛教团体有较大的信任。<sup>18</sup>

中共试图借由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力来建立“软实力”。

中共利用佛教和道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最显著的例子或许来自胡锦涛时代所推动的「和谐社会」运动与佛教和道教教义的关联性。2006年四月在中共网站官方新华社的一篇文章明确地指出此关联，该文章表示，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释出讯息说“佛教的教义是被无神论政府正式认可为有助於创建和谐社会。”<sup>19</sup> 2010年，时为政治局常务委员的贾庆林对中国道教协会也表达类似的诉求。根据新华社报导，贾庆林要求“协会提倡道教经典中的和谐理想，使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sup>20</sup>

在中共试图引导中国信仰朝向其认为政治安全的方向，对于汉传佛教成为对该政权特别有吸引力的执政工具，学者们提出几个解释因素：

- 汉传佛教领袖和出家人有支持政权和政治服从的历史。相较其他信仰，汉传佛教较少有使其难以对皇帝或执政党效忠的教义。此外，作为佛教信仰活动中心的寺庙本身，无法被移动，也无法被取代，这意味若宗教领袖进行公开政治反抗，将冒着为其信仰招致严重损伤的风险。<sup>21</sup>
- 中国领导人相信传播佛教有助推行礼仪、鼓励人民较具有同情心、以及为社会紧张提供安全阀，同时又不会引来政治改革的要求。<sup>22</sup>
- 佛教领袖对与党国合作的接纳度高。他们呼应政府对慈善工作的需求，<sup>23</sup> 采用官方论述来推动对佛教友善的政策，<sup>24</sup> 并主动地展现他们的政治忠诚，譬如协助政府对其他信仰团体的打压。<sup>25</sup>

- 佛教广泛在邻国存在代表佛教可以作为共同文化遗产的来源，也可以作为统一台湾社会的要素。<sup>26</sup>
- 中国领导人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态度之所以谨慎，起于两个信仰与外国文化、圣地、和权威之间的链接，以及它们长久来反抗政治压迫的历史。相比之下，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千年来，已经逐渐中国化。

以上几点也适用于道教（例如其为本土宗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紧密、在台湾为重要的群众信仰），对中共而言，道教也是具有吸引力的助手。

### 习近平以来的汉传佛教和道教

自从2012年11月接任中共领导人以来，习近平主要延续胡锦涛时代的佛教和道教政策。2013年，他会见台湾一佛教组织的领袖，<sup>27</sup> 2015年十月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江苏省举办。<sup>28</sup> 2014年中国首次主办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此国际佛教组织具有悠久的历史，于1950年在斯里兰卡成立，主办该活动展现为中国展现软实力的重大胜利。<sup>29</sup>

## 2014年夏天北京四处可见标语“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然而，此时期的宗教政策还是有些微的调整，尤其在针对宗教的论述和方法上。中共应对宗教的手段显得更加明确和尖锐。

1. **官方论述从“和谐社会”转变成“中国梦”**：如上所述，过去十年常见的官方说法提到佛教如何能协助达成胡锦涛领导时期的中心宣传“和谐社会”。自从习近平创建“中国梦”一词来描绘中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佛教和道教被高举为能达成此目标的资源。本章开头引用的文字摘自一篇2013年文章“佛教与中国梦”，即为一例。
2. **加强利用中国宗教来支撑中共正当性**：习近平本身和中共的宣传机器整体上渐增引述传统中国文化—佛教和道教为主要组成要素—为共产党价值和政治领导背书。2014年夏天北京四处可见标语“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三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说，其中一段认可佛教对中华文化的正面影响和中国自身对佛教发展的影响。各类佛教刊物作者诠释该演讲内容为官方确认佛教不会被排除在“中国梦”之外，并乐观预测其开启佛教在中国的新纪元。<sup>30</sup>
3. **更加明确表达对“外国”宗教势力的担忧**：中共一直以来试图把国内信众与国外信仰权威区隔开来，自治和独立於外国势力是其一贯的宗教政策。然而，习近平在2016年四月对党干部一重要演说中强调：“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渗透中国，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sup>31</sup> 应是指基督教的增长、藏人持续崇敬流亡的达赖喇嘛、以及顾虑维吾尔穆斯林中极端分子的暴力。该发言也符合习近平任内中共领导人对“西方”价值的普遍敌意，当局对本土的汉传佛教和道教持偏好观点。

尽管有这些论述上的调整，并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在政策或其执行上有具体的变化，汉传佛教和道教受惠於这些论述，主要是在于未被当局提及：它们没有像其他宗教团体和世俗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在习近平任内明显遭受更严苛的对待。

### 政治控制的主要方法

虽然汉传佛教和道教与党国保持较为合作的关系，但是该关系有一个重要的压迫面向，中共政权试图透过控制宗教领导和宗教发展，来确保他们的政治忠诚度以及维护他们为党目标所带来的好处。在此过程中，当局限制中国公民从事他们的自身的信仰、违反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

许多限制手段在习近平主政之前就已经存在，在过去四年，以四个主要方式呈现：

- 1. 官僚监管与国家干预：**佛教与道教领袖和信徒遭受三重监管：首先是透过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它们表面上是非政府单位，但与国家单位密切合作，指导宗教的发展和动员宗教界来支持官方政策；国家宗教局；以及中共的统一战线部门，负责管理非党群体与党之间的关系，如宗教团体。这三个党政机构的分支和代表有网络直达村、区、和寺庙。

举例来说，许多寺庙由出家人和与地方宗教局有关系的寺庙管理委员会所共管。<sup>32</sup> 许多商业化的寺庙由其他负责保护和推动文化或历史遗产的政府单位来管理。自2010年起，中国佛协领导层的国家派出人员明显增加，这些高层职位过去一般由宗教领袖和信徒担任。2015年的换届更加深此一趋势，中国佛协秘书长和国宗局一司司长—刘威和王健—基本上互换职位。类似的转变近几年也发生在中国道教协会的的领导阶层。<sup>33</sup>

- 2. 不切实际的登记条件：**根据2004年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宗教场所若要进行官方登记，必须证明有稳定的合法收入、必须是由合格宗教教职人员所领导的固定祈祷聚会点、申请登记必须由爱国宗教组织所提出。然而，许多小寺庙因为没有官方出具的产权证明或是没有爱国宗教团体所认证的宗教教职人员，并无法符合这些标准。该登记条件导致有大批的宗教活动场所，无法注册。

鉴于登记所有宗教活动场所所带来的挑战，近年来当局也采取手段欲将未注册登记的寺庙道观访客引导到已注册的场所。2012年10月，国宗局和九个其他政府单位下达指示，禁止非注册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地点从事宗教活动和收取捐款。<sup>34</sup> 同时，国宗局也在各地推进宗教活动场所挂牌，<sup>35</sup> 区分宗教与非宗教活动场所，其也设立网页列出所有其已核准的场所。<sup>36</sup>

- 3. 限制宗教教职人员认证：**中国佛教协会于1994年已经集中发放戒牒，但其也将传戒仪式限制在一年最多十次，一次最多350名受戒人员，因此每年最多有3,500人得以受戒，虽说多年以来实际传戒人数更少。<sup>37</sup> 受戒人员除了要所驻寺院同意之外，还要当地佛协和宗教局同意，此规定等于将个人的政治可靠度纳入传戒过程。自2000年起，只有通过官方正式登记、具有五名以上佛协认证僧尼的寺院才能招收弟子。

目前道教正一派仅举行过三次授仪式（始于1949年），最近一次于2011年。

道教方面，中国道协也垄断印制发放道教教职人员证，举办过更少的传戒、授箓仪式。目前道教正一派仅举行过三次授箓仪式，最近一次于2011年。反之，海外正一派道士（尤其来自台湾）的授箓仪式自1991年以来每年在龙虎山举办，其主要目的在于推进“祖国统一”<sup>38</sup> 此限制使中国境内的道教弟子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在道教的信仰体系里，个人出家修行没有透过传戒或授箓仪式，就无法正式被纳入师父的世系，以名箓天曹、取得道位。

- 4. 个别暴力压迫事件：**近几年来不时有中国政府因为寺庙没有注册或者因为广泛经济考量，强拆部分或者全部庙产。一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是2014年二月一百名城管部署至福建省厦门市，拆毁一座据称是违建的佛寺，导致政府与当地居民的暴力冲撞。<sup>39</sup>

在个人层次方面，出家人若批评政治或者表达支持人权会面临到监控、行动管制、甚至牢狱之灾。2016年四月，武汉一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宣判佛教僧人圣观（俗名徐志强）四年徒刑，<sup>40</sup> 该罪名通常只用在政治异议份子。<sup>41</sup> 圣观法师於2015年五月



在讲经说法时，被当局逮捕拘留，时届天安门屠杀25周年、政府广泛取缔疑似参与纪念活动的中国公民。囚禁佛教僧人极为少见，圣观的刑罚被人权律师及其弟子视为严重违反宗教自由。该案也向其他出家人明确传达政府讯息，亦即，若其社会良心和个人的宗教诠释违背对中共的政治忠诚，将可能承担负面后果。

### 经济上利用寺庙财产

文革后寺庙一重新开放，地方官员就开始将庙产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内与国际旅客增加，庙产的商品化日趋势益加深。

商品化有几种形式，在部分案例中，寺庙没有教职人员而完全为观光景点，一位学者称其过程为寺庙的“博物馆化”，<sup>42</sup> 例子有北京白塔寺或扬州天宁寺，这些寺庙由政府单位管理，其功能以旅游和维持文化遗产为主。<sup>43</sup> 在寺庙有出家人的状况下，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将寺庙圈在景区内，收取高额景区门票，或强迫僧人收取及分享寺院收入，寺院领导对门票少有控制权。<sup>44</sup>

也有部分寺庙僧人自愿收取门票，但这是由于在文革刚结束后，寺庙尚未建立信众和宗教捐款来支持其生存，这些寺院的门票通常非常低廉。

反之，一旦寺院被圈到景区里面，参访寺院的成本大幅增加，举例来说，162座全国重点寺庙在2013年对外开放，寺院平均门票为6元（0.9美元），但是61座寺庙在景区内，因为有额外景区门票，进入寺庙的成本总平均变为59元（8.8美元），几乎增加十倍。在著名的场所，景区门票收入可以很快累积为重要地方收益，譬如，佛教圣地普陀山2015年接待旅客664万人次，成人门票为160元（23美元），总门票收入超过10亿元（几近一亿五千万美元），<sup>45</sup> 旅客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还来自于他们交通、住宿、用餐、及购买纪念品的花费。

如中国其他剥削发展的作法，像非法土地征收或是强制拆迁，寺庙商品化很大一部份是因为地方官员正式升迁评比中，纳入经济发展数字。<sup>46</sup> 此外，地方干部时常被重新指派到其他地区，许多官员因而寻求短期能增加政府收入和提高经济发展数据的方式，而不考虑到该方式对当地民众的长远影响。

## 经济剥削是共产党与基层佛教和道教神职人员紧张官方关系的主要根源。

圈寺院收门票即是此具有吸引力方式，尤其圈庙不像其他开发作法可能会毁坏环境。因此，根据近年来在该题目上进行田野调查的张贵闵说，“将进入寺庙和取得宗教服务管道挂上价格标签的压力不断存在。<sup>47</sup> 有趣的是，至少在理论上，中央政府试图阻止地方这类做法，然而，由于其并未采取行动改变升迁制度的诱因或者惩处追求此升迁策略的地方官员，仅口头非难对遏止该现象，效果非常有限。

一份在2012年六月到2015年五月针对23座著名寺庙的研究发现，若给予选择，一般宗教领袖偏好寺院免费开放。<sup>48</sup> 就他们而言，收取高额或是任何门票有几点可议之处。首先，门票使得低收入民众难以取得宗教服务，包括在佛教道教认为能为信众带来功德的重要仪式，而对能够负担门票的民众来说，高额门票可能降低他们到寺庙来祈福、烧香、或者寻求精神依归的频率。第二，门票并非自愿奉献，强迫奉献违反欲达佛教觉悟中最根本所需的自由意志和道教无为的原则。第三，信仰权威传统上来自信众的积极信服，高额的费用、景区当局雇用假僧假道提供不当（但高收益）的宗教服务，都有损寺院内出家人的权威。

上述事态变化表明，地方官员实行的经济剥削和试图将寺院商品化的行为已成为党国体制与基层佛教、道教神职人员紧张关系的根源。

## 宗教界回应及反抗

如上所述，佛教高层领导对中共及其治理目标，展示高层度的政治顺服，然而，即使像佛教这个政治上相对服从的宗教，与党国机构也非没有关系紧绷之时，尤其在地方层级。地方汉传佛教和道教领袖对政治控制的反抗，大多有以下两种主要方式：

- 1. 利用政策执行的落差来扩张宗教活动的空间：**这个趋势可见於广泛宗教活动发生于未登记的寺庙和宗教慈善活动。学者苏珊·麦卡锡（Susan McCarthy）就她研究的佛教慈善团体指出，这些团体有效创建平台让信众实践佛教教义、经历信仰上的觉知、以及在政府规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之外，对一般大众介绍佛教概念，例如慈悲。<sup>49</sup>
- 2. 阻挡商业化：**由于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复苏，出家人的社会影响和财政资源比起文革后初期有大幅长进，出家人与地方官员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显然让出家人更能决断保护庙产免于被侵犯、甚至逆转已发生的商业化现象。<sup>50</sup>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级都可见汉传佛教和道教界反对商业化，其表现有几种形式，从法律实践到温和的抗争。

- 1. 提倡立法改革赋予寺庙法人地位：**宗教团体不适用中国法律下的四种法人形式：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没有法人身分，寺庙本身在法律上无法独立进入诉讼过程，而必须依赖相关宗教协会在法庭上代表他们，或是为他们与政府机构协商。这导致普遍的商业剥削现象，宗教领袖於是倡议在法律上增加第五种“宗教法人”。

除了个别宗教领袖像是少林住持释永信在2007年与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该议题之外。<sup>51</sup> 官方宗教团体和其代表也开始从事推动该议题。时任中国佛协会长的释传印在2013年及2014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提议解决寺庙缺乏法人地位的问题。<sup>52</sup> 国宗局研究中心也著手进行调查该议题，并於2013年在出版期刊《中国宗教》中，发表其结果。<sup>53</sup> 官方支持预期可使该改革推动更易成功。

- 2. 利用法院保护宗教商标：**2014年，中国道教协会针对一珠宝公司注册城隍（道教神祇）为商标，代表上海城隍庙的官司获得关键胜诉。一般广泛认为法院判决认定以道教神祇名称作商业用途会“伤害道教信众的宗教感情”，是对抗商业化的胜利。<sup>54</sup> 受到该官司的鼓舞，中国道协，在受到国宗局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道教代表支持下，表明他们会继续诉请取消其他类似商标。<sup>55</sup>
- 3. 口头上协商、民众压力、以及请愿地方官员：**地方寺庙领袖近年来成功使用各种论述、施压点、以及民众压力与地方政府协商开放寺庙、降低门票、防止拆迁、甚或争取寺庙管理上更大程度的自主性。这些手段包括列举圈寺庙后会丧失地方总收入及引发民众不满；<sup>56</sup> 如果增加或不改变门票金额，旅客会转向其他门票金额较低的竞争寺庙；<sup>57</sup> 让宗教领袖按照其方式管理寺产有助认证该宗教场属于特定重要宗教嫡系，而能进一步推动地方观光和经济发展。<sup>58</sup>

随着中国公民运动的大体趋势，僧人也利用社群媒体公开地方官员对庙产的威胁，而迫使其放弃该计划。相关例子有2013年地方政府公布将拆迁兴教寺僧人的宿舍、并且计画建设景区。兴教寺以保存玄奘遗骨而闻名，玄奘远至印度追寻佛法，启发中国经典文学著作《西游记》。由于玄奘对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该计划透过社群媒体揭露之后，招致强烈民众反对，以及中国佛协和国宗局的批评，各方反对使地方政府最终取消拆迁和圈庙的计划。<sup>59</sup>

- 4. 非合作式的抗议：**近年来在协商努力失败后，部分寺庙诉诸更加果断的策略，其中特别常

## 僧人也利用社群媒体公开地方官员对庙产的威胁，而迫使其放弃该计画。

见的是对外暂时关闭寺庙。这个寺院王牌策略可见於河北省、陕西省、和云南省等，<sup>60</sup> 这策略显示，若僧人不同意让旅客进入寺庙，地方政府根本无法赚取任何收益，这样细致的反抗行动若被放上网，也会伤害地方官员在当地居民和广泛宗教界当中的声誉。

该类行动迫使地方官员重新计算圈庙收高额门票的得失，在这些自由之家所取得的案例中，官员们在僧人关门抗议的几周、几天、甚至几小时之内，皆改采更为怀柔的姿态。另一个以无声抗议策略来提醒官员寺庙合作的重要性，则为著名宗教领袖缺席官方典礼。<sup>61</sup>

### 未来展望

作为中国最大的制度性宗教，汉传佛教在中国社会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而道教则为真正的本土信仰。两者皆被中共视为潜在的治理伙伴。鉴于习近平口头强调传统中华文化以及政府对两个宗教国际会议及慈善工作的支持，中国领导者对这两个宗教的偏好可能会在往后以更加具体及财务的方式表现出来。

即便享有官方偏好，汉传佛教和道教还是受到一连串政府控制、违反其自主性，尤其在商品化方面，造成一般宗教领袖的反感。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减缓，宗教商品化可能有两个演变方向。一方面当其他收益减少，如果地方官员仍视商品化寺庙能带来丰厚的消费者驱动经济收入，寺庙商品化的压力可能会升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迟缓影响到中国中产阶级，使他们到宗教场所旅游的资源减少，因而降低开发宗教场所的动力。

在新经济情况下，不论哪一个路径最终变成主流，可以确定的是至少部分商业化动力会持续下去。鉴于寺庙的社会资本会进一步随着和传佛教和道教的持续复苏而增长，而僧众会注意到其他寺庙的成功策略，果断反对地方政府商品化寺庙的新案例可能会持续浮现，但这同时也可能引发官方更加强悍的回应。

### 注解

1. 方立天，「佛教与中国梦」，《中国宗教》2013年第12期，第28-31页。
2. Kuei-min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Academic Commons, 2016, <http://dx.doi.org/10.7916/D8SN097K>
3. 本报告称「汉传佛教」以区分藏传佛教（不论是由藏人或是汉人信仰），其组成大多为大乘佛教，但也包括禅宗和上座部佛教。
4. 这些数据排除藏传佛教。根据官方数据，直至2014年，中国有27,700大乘佛教活动场所、1,700上座部佛教活动场所、以及9,000所道教活动场所。见国家宗教局，“我国宗教的基本概况”，2014年4月1日，<http://www.sara.gov.cn/llyj/63734.htm>
5. 这个数据是根据国家宗教局资料，直至2014年，有登记72,000汉传佛教教职人员、上座部佛教2,000名、道士48,000人，国家宗教局，“我国宗教的基本概况”，2014年4月1日，<http://www.sara.gov.cn/llyj/63734.htm>
6. Katharina Wenzel-Teuber, "2015 Statistical Update on Religions and Church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Today's China* 6, no. 2 (2016): 20-43.
7. 该研究中心不另列道教，但是指出约两亿九千四百三十万人信仰民间宗教（佔总人口百分之21.9），因为许多中国人混合信仰，这些人口可能与部分佛教徒重叠。Pew Research Center's Religion & Public Life Project,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China," (2016年6月10日浏览)，[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countries/china#/?affiliations\\_religion\\_id=0&affiliations\\_year=2010%C2%AEion\\_name=All%20Countries&restrictions\\_year=2013&region\\_name=All%20Countries](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countries/china#/?affiliations_religion_id=0&affiliations_year=2010%C2%AEion_name=All%20Countries&restrictions_year=2013&region_name=All%20Countries)
8. 与不愿具名的中国研究学者访谈，2016年6月。
9. Gareth Fisher, *From Comrades to Bodhisattvas: Moral Dimensions of Lay Buddhist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10. Zhe Ji, "Chinese Buddhism as a social force: Reality and potential of thirty years of revival,"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5, no. 2 (2012): 8-26.

11. 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张贵闵电子邮件通讯, 2016年6月。
12. 梅江区政府, “中国道教的地域性差异”, 2014年10月6日, <http://www.meijiang.gov.cn/sonweb/slj/content.php?IndexID=175927>
13. André Laliberté, “The 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 by the CCP: A Selective Retrieval,” *Asiatische Studien-Études Asiatiques* 69, no. 1 (2015): 185–211, <https://www.degruyter.com/abstract/j/asia.2015.69.issue-1/asia-2015-0010/asia-2015-0010.xml>
14. 同上。
15. Shaohui Tian, “4th World Buddhist Forum held in E China,” *Xinhua*, 2015年10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photo/2015-10/24/c\\_134746459.htm](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photo/2015-10/24/c_134746459.htm)
16. Laliberté, “The 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 by the CCP: A Selective Retrieval.”
17. Laliberté, “The 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 by the CCP: A Selective Retrieval.”
18. “Taiwanese charity group opens branch on Chinese mainland,” *Xinhua*, 2010年8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0-08/21/c\\_13455075.htm](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0-08/21/c_13455075.htm)
19. 在同一篇文章, 时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进一步暗示佛教原理可能影响胡锦涛时代的标语, 他说“佛教哲学为…中国和谐社会概念的重要关联。”见“China Highlights Role of Buddhism in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New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06年5月10日, <http://english.cpc.people.com.cn/65547/65571/4480957.html>
20. Guanqun Wang, “China’s top political advisor urges Taoists to contribute to social harmony,” *Xinhua*, 2010年6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0-06/23/c\\_13365541.htm](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0-06/23/c_13365541.htm)
21.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22. André Laliberté, “Buddhist Charities and China’s Social Policy. An Opportunity for Alternate Civility?” *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158 (2012): 95–117.
23. 同上。
24. Ji, “Chinese Buddhism as a social force: Reality and potential of thirty years of revival” ; Koen Wellens, “Failed secularisation, new nationalism and governmentality: The rise of Buddhism in post - Mao China,” *upublisert manuskript, mottatt* 31 (2015): 15.
25. 一个在学术文献中被反覆提及的例子是中国佛协领导人对1999年反法轮功运动明确的支持, 甚至2001年和2002年, 佛教僧人代表团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增援中国外交官对法轮功的诋毁论述。2015年七月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浙江省当局找来佛教僧人作为平衡或挑拨一个针对强拆十字架的基督徒抗议现场。见 Ji, “Chinese Buddhism as a social force: Reality and potential of thirty years of revival” ; Wellens, “Failed secularisation, new nationalism and governmentality: The rise of Buddhism in post - Mao China” ; Yang Fan, Wen Yuqing and Luisetta Mudie, “ ‘Chanting Monks’ Deployed in Standoff Over Cross Demolition in China’s Zhejiang,” *Radio Free Asia*, 2015年6月27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hina-churches-07272015103543.html>
26. 与张贵闵电子邮件通讯, 2016年六月。
27. Cindy Sui, “Meeting Taiwan’s new-age Buddhists,”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anuary 29, 2014,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25772194>.
28. Tian, “4th World Buddhist Forum held in E China.”
29. Han Bin, “Conference of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opens in China Thursda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2014年10月15日, <http://english.cntv.cn/2014/10/15/VIDE1413351242533693.shtml>. 亦见 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网站, <http://wfbhq.org/>
30. 部分官员可能试图利用佛教加强党自身正当性的一极端例子为2016年六月一张在中国社群媒体流传的不具名照片, 该照片内佛殿挂着一横幅写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 见 Jiang Wu, *Twitter*, 2016年7月1日, <https://twitter.com/gisphilia/status/748907792207978498>. 亦见 Wellens, “Failed secularisation, new nationalism and governmentality: The rise of Buddhism in post - Mao China” ; 李湖江, “佛教梦与中国梦”, 《法音》2014年第7期, 第41-43页。
31. Huaxia, “Xi calls for improved religious work,” *Xinhua*, 2016年4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4/23/c\\_135306092.htm](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4/23/c_135306092.htm)
32. Brian Nichols, “Tourist Temples and Places of Practice: Charting Multiples Paths in The Revival of Monasteries,” 即将出版书之章节。
33. 王哲一任中国道教协会理事长直到2015年中, 其先前为国宗局一司副司长。 “Corrupt Official Gets Chinese Bloggers Excited,” *Real China (blog)*, *China Uncensored*, <http://www.chinauncensored.com/index.php/real-china/846-corrupt-official-gets-chinese-bloggers-excited>
34. 美国国会中国执委会, 2013年度报告, 2013年10月10日, <http://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AR13DJ.PDF>; 国家宗教事务局, “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 2012年10月22日, <http://www.sara.gov.cn/xwzx/xwj/17145.htm>; ‘ ‘China Bans Profiteering From Religious Activity,’ ’ *Xinhua*, reprinted in *China Daily*, 2012年10月23日, [http://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2-10/23/content\\_15837978.htm](http://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2-10/23/content_15837978.htm)
35. 余杭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门, “区民宗局对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夜间突袭检查”, 2015年3月25日, [http://www.yuhang.gov.cn/index/oatest/201503/t20150325\\_985284.html](http://www.yuhang.gov.cn/index/oatest/201503/t20150325_985284.html); 重庆市民宗委, “重庆市全面启动道教活动场所标示牌挂牌工作”, 2015年3月16日, <http://www.sara.gov.cn/dfgz/204170.htm>

36. 见国家宗教事务局, “宗教场所基本信息”, <http://www.sara.gov.cn/csjbxx/>, 2016年11月16日浏览; 重庆市民宗委, “重庆市全面启动道教活动场所标示牌挂牌工作”, 2015年3月16日, <http://www.sara.gov.cn/dfgz/204170.htm>
37. 见国家宗教事务局, “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 2010年, 12月20日。
38. 1994年至2011年間, 一年傳戒寺廟控制在五到八所; 每次儀式接受300受戒人員。“中國佛教協會1994年傳戒試點在江西永修縣雲居山真如寺舉行”, 《法音》1994年第12期, 第21頁; “抓好傳戒工作, 促進僧團建設”, 《法音》1999年第2期, 第9-13頁。
39. 对华援助新闻网, 「福建: 城管强拆村中新建寺庙与村民爆发冲突」2014年2月27日, [http://www.chinaaid.net/2014/02/blog-post\\_3393.html](http://www.chinaaid.net/2014/02/blog-post_3393.html)
40.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 “Xu Zhiqiang,” 2016年8月2日, <https://www.nchrd.org/2016/08/xu-zhiqiang/>
41. 此非圣观第一次和中国当局的冲突, 他在2001年出家前, 曾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后被囚禁一年, 此后他便面临不同程度的官方打压, 包括在2006年被强制驱逐出江西省一座寺院管理人, 因为他为1989年亡魂超度以及试图保护寺产被地方官员征收。Human Rights in China, “Top Buddhist Officials Join in Persecution of Activist Monk,” 2006年8月25日, <http://www.phayul.com/news/tools/print.aspx?id=13662&t=1>
42. Gareth Fisher,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Tourists: Buddhist Revival at Museum/Temple Sites in Beijing,” *Social Compass* 58, no. 4 (December 2011).
43. Nichols, “Tourist Temples and Places of Practice.”
44.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45. 控制寺庙和其收入一直是僧众、寺庙组织、和佛协之间的冲突点。普陀山官网, “2015年12月普陀山旅游主要指标统计数据”, 2016年1月6日, <http://www.putuoshan.gov.cn/Detail/322/114392.html>. David L. Wank, “Institutionalizing Modern ‘Religion’ in China’s Buddhism: Political Phases of a Local Revival,” in *Making Religion, Making the State*, ed.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 Wank (Stanford, 2009)
46. Sarah Cook, *The Politburo’s Predicament: Confronting th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sion* (Freedom House, January 2015),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china/politburo-predicament>
47. 与张贵闵电子邮件通讯, 2016年六月。
48.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49. Susan McCarthy, “Serving Society, Repurposing the State: Religious Charity and Resistance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70 (July 2013).
50. Nichols, “Tourist Temples and Places of Practice.”
51. 与张贵闵电子邮件通讯, 2016年六月。
52.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53. 同上。
54. 同上。
55. 同上。
56. 见Temple West example in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57. 见Temple Buddha example in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58. 见Temple South example in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59. 张世辉, “谁来保护兴教寺”, 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3年4月16日,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392721-1.htm>
60. 最近类似案例于2014年八月发生在昆明盘龙寺, 该寺对外关闭来抗议地方政府单位迫使其「商业化与企业化」, 当时市长反应迅速, 坚称此事件仅是误会, 住持中午前重新开启寺庙。Nichols, “Tourist Temples and Places of Practice: Charting Multiple Paths in The Revival of Monasteries”; Patrick Scally, “Fearing ‘commercialization,’ monks briefly close Jinning temple,” *GoKunming*, 2014年8月18日, [http://www.gokunming.com/en/blog/item/3298/fearing\\_commercialization\\_monks\\_briefly\\_close\\_jinning\\_temple](http://www.gokunming.com/en/blog/item/3298/fearing_commercialization_monks_briefly_close_jinning_temple)
61. 与张贵闵电子邮件通讯, 2016年六月。



自由之家是一个非营利、  
无党派机构，支持民主变  
化，监督自由，倡导民主  
和人权。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120 Wall Street, 2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5

[www.freedomhouse.org](http://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https://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https://twitter.com/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mailto:info@freedomhouse.org)

---